

WENHUAZHEXUECONGSHU

人的主体性 和人的解放

● 欧阳谦 著





文化哲学丛书

欧阳谦 著

人的主体性 和人的解放

——西方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初探

山东文艺出版社

《文化哲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孟伟哉 包遵信

副 主 编

方 鸣 陈子伶 于克平

常 委 编 委

孔令新 王 炮 高福庆 谢选骏 吴学金

编 委

周国平 何怀宏 洪汉鼎 鲍玉珩 郑荣来

陈小雅 刘 嘉 薛 潟 马学渐 吴根梁

褚玉泉 朱大可 王 平 许苏民 郁玉华

文化哲学丛书

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解放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初探

欧阳谦著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5.125印张 2插页 110千字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400

书号 10331·258 定价 1.25 元

我为什么要主编《文化哲学丛书》

这一套《文化哲学丛书》，由包遵信同志和我联袂主编，我们共同地对这套丛书担负了道义上的责任。当然，担任副主编乃至编委的同志，亦有责任在肩。事实上，他们做的工作还要更多一些。因此，我提议，由包遵信同志和我各写一段文字作为代序，以示郑重。

在我看来，人类迄今所创造的一切“硬件”和“软件”，制度和政体，或者“软——硬件”，包括人本身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和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软件”和“硬件”，都可以归结为文化现象，因而都可以以历史的观点和哲学的观点予以概括、辨析和论证。这样的概括、辨析、论证，对于今天的中国是有意义的，对于中国的未来也许是更有意义的。因为，正如解剖猴体有助于对人的生理的了解和认识，对于任何历史因果和历史基因的科学探讨，都有助于我们的批判和扬弃、继承和革新。人们说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思想观念的现代化，我是很同意这种见解的。

虽然我有如上的看法，我之同意担当主编，绝不是因为我对本丛书的众多的选题和纷繁的内容都有研究和发言权，恰相反，而是由于我所知甚少而又想知道一切，有一种强烈的求知欲，即使自己做不到，也愿意在别人艰辛探索的领域里，去分享智慧和快乐。看着别人怎样确定一个命题，怎样发现一系列

2193/33

事实，怎样阐发出一层又一层的道理，怎样推导出一个又一个结论，怎样构建了自己的逻辑体系，确实是一种极高的精神享受。

我愿特别说明的是，本丛书的大多数作者，都是三、四十岁的中青年。他们是一代新人，一代新的学者。他们之所以能够在思想的王国里纵横驰骋，乃由于急剧变革的时代要求着他们各逞才情。封闭的门窗打开了，禁锢的枷锁挣断了，世界和历史越来越以其真实的面貌展现于我们眼前，映射于我们的头脑，为了真正掌握自己的（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是国家的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我们必须大胆地无畏地勇敢地研究、探索、思考许许多多问题，乃至开拓许许多多崭新的科学领域。随着本丛书的陆续问世，读者将会看到，你是走进了一个丰富多彩的知识和思想的宽天阔地，而且你会从正面或侧面，得到很多启发。

我们希望本丛书真正成为“诸子百家”式的。就是说，它绝不是宗派的排他性的，而是在观点上可以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如果有一本著作与本丛书已经出版的另一本著作论战，只要著者乐意，本丛书将竭诚收编。至于对本丛书中的任何一个观点有不同见解的读者，当然有权撰文论辩。假如本丛书能够得到一百位作者支持，最终能够出版一百本，而同时假定有一百篇文章与之论辩，我们将十分高兴地愿意把这些论辩文章编辑成册，作为本丛书最有意义的附录出版。

孟伟哉

一九八六年九月

文化哲学的兴起 ——我们的宣言

当前中国思想文化界，正掀起一场文化讨论的热潮。参加讨论的，既有老一辈学者，也有中年专家。特别令人振奋的是，许多有出息有作为的年轻一代学者加入了讨论的行列。他们都在思索着现代化提出的问题。这一思索凝聚到一点，就是：中国古老的文化能否在现代焕发出新的青春？西方现代文化给我们提出的挑战，我们敢不敢于回答？文化在呼唤着哲学，哲学也眷恋着文化。文化哲学正在成为人们瞩目的领域。

为了给正在兴起的文化哲学的研究提供一块阵地，我们创办了这套大型学术丛书——《文化哲学丛书》。它将立足于中国现代化的现实需要，对各种文化问题从哲学高度进行探索，为我们民族的振兴贡献我们的思考。

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如果追溯它的历史，可以推到上个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近代工业文明发展，文化也将超越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形成富丽多彩的世界文化（《共产党宣言》，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四七〇页）。可是很长时期，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愚昧，我们的现代化一直是处于被动防卫性质。今天我们是在新的起点上奔向现代化。我们人民的历史主体意识已经觉醒，传统文化的文思激发我们重新崛起的决心，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用世界的眼光，开

放的心胸，来审视人类文化一切优秀的成果。管它东方西方，只要有利于我们的现代化，我们就敢于去拿，主动进行选择。消化了，吸收了，就是我们的文化，就是我们的现代化。

文化是人类对幸福和光明的追求和创造，它展现的是真，是善，是美，是人的美好的心灵。文化的现代化，就是人的本质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人类从必然王国展翼向自由王国飞翔。现代化最早是从西方起步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虽然给人类文明创造了惊人的成果，但同时也给历史留下野蛮的印痕。它们把西方文化那种高尚激昂的骑士热诚、侠义的血性、小市民的温情，一概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冷水之中。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四六八页）。我们的现代化，则要使每个人都成为有理想，有觉悟，有文化，有教养的人，我们要用人类创造的全部文化成果丰富自己，使自己成为全面发展的现代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也将成为充分发展、有着完整意义的现代文明。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要继承我们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更要吸收人类文化的全部辉煌成果。我们有信心完成历史赋予自己的使命，只要我们能站在伟人的肩上就不愁完成不了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这套丛书就是帮助人们了解世界文化思潮，瞻仰那些思想巨人、文化伟人的丰采，领略他们的精神，撷取他们的成果。我们欢迎有志于中国现代化的青年学者，和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个任务。

包遵信
一九八六年九月

目 录

我为什么要主编《文化哲学丛书》	孟伟哉
文化哲学的兴起——我们的宣言	包遵信
绪 论：探索、组合的三阶段	1
第一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文化根源.....	10
1.垄断资本主义和“文化危机”思潮.....	11
2.物理学革命和生命哲学思潮.....	18
3.道德改革和弗洛伊德主义.....	24
4.人的抉择和存在主义.....	29
第二章 主观辩证法的确 立.....	36
1.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	37
2.总体性和主体——客体的同一.....	43
3.自我意识和“异化”的扬弃.....	49
4.“否定辩证法”	54
第三章 意识形态的构成和作用.....	61
1.卢卡奇的“物化意识”和“阶级意识”	62
2.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	68

3. 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	74
第四章 心理活动的机制	88
1. 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联姻	90
2. 赖希的性格结构分析	95
3. 弗罗姆的法西斯主义心理学	100
4. 权威和家庭	105
第五章 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批判	113
1. 发达工业社会的“消费控制”	115
2. 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	119
3. 马尔库塞的“单面人”和“大众文化”批判	123
第六章 文化革命和人类的解放	131
1. 阶级意识的“神话”和文化霸权	132
2. 心理结构的改变	138
3. “新人”的出现	144
结束语：人类解放的启明星，并没有升起	149

绪 论

探索、组合的三阶段

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已走过了一百多年风风雨雨的发展历程。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克思主义不但没有衰亡，反而更有影响了，借用一些西方学者的话说，马克思主义是“二十世纪所有社会思想的产婆”，马克思主义成了“我们时代的不可超越的哲学”，“没有马克思及其对世界的影响，那么既不可能有世界东方的自我意识，也不可能有世界西方的自我意识。”⁽¹⁾马克思主义在现代西方社会思潮中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表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因为，一种理论要生存下去并且要继续左右人们的思想行为，除了它所具备的深刻洞见以外，必须不断地完善、发展自己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状况。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科学技术的“魔杖”和垄断资本的“撒旦”结合起来，导演了现代西方社会的一幕幕悲剧。触动社会各个领域的周期性经济大危机和资本主义的一次次复苏，两次世界大战的“毁灭”和战后的重建，二十年代欧洲工人运动的失败和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发达工业社会的相对稳定和西欧革命运动的低落，西方人眼中的“斯大林主义”的出现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曲

折，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兴起和西方霸主地位的动摇，等等，这一切都向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挑战。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些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释和“补充”。这些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遵循两条基本的准则，即西德哲学家斯密特所说的，当我们发现马克思的有些理论有问题时，以及一些马克思的理论不能回答问题时，我们就有两种选择：一是用现代资产阶级的理论学说来“充实”和“完善”马克思主义，二是找出马克思著作中潜在的东西来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这两条准则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创以来的理论活动的基本特征。

从一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中心问题就是，为什么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始终没有发生？为什么二十年代轰轰烈烈的欧洲工人运动走向失败？苏联十月革命建立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吗？有没有适合西欧发达国家争取人类解放的革命战略？在生命哲学的新黑格尔主义，西方文化危机思潮，弗洛伊德主义以及存在主义的影响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人的主体性或“自我意识”的能动性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答案。他们倾全力于人的主观结构、心理倾向和大众文化的分析批判，把意识的改变视为革命成功的根本保障。他们只关注社会结构及其矛盾是怎样转化为意识形态并使之合理化的，不合理的权力关系是如何由大众的心理结构来维持的。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关于人类的解放的学说，是把人的主体性和人类的解放联系在一起的“实践哲学”。就在今天，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的剖析仍是不可取代的，它仍然是现在工人运动和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但是，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也遇到了新的课题。这是因为，一方面社会的变

近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诸如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渗透、国家权力的膨胀，异化的新形式以及无产阶级历史作用需要有新的探讨；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自身还有待完善和发展。尽管马克思早年也很注重人的主观结构——物化思想，商品拜物教和意识的反作用，也强调人是自己历史的创造者，但他受制于当时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对文化意识形态和人的心理结构分析不多，估计也不足。尤其是马克思的后继者们（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从机械论出发，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出“决定论”的或“实证主义”的解释，结果就抹杀了人的主体性，放弃了革命成功的基本前提。于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重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或叫文化批判理论）的历史任务，以人的主观意识为基础构想了人类解放的蓝图——关于“文化革命”的总体设计。

我们知道，人的主体和人类的前景之间的关系，乃是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愈发突出的核心问题。随着现代西方社会各种危机的不断深化，个人的生存问题和人类的命运就摆到了当代理论研究的首位。在现代西方哲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历史学中盛行的“文化批判”思潮，都把探求“文明危机”的出路和人类面临的抉择作为理论活动的起点和归宿。这种思潮坚信，

“现代人类与其说是苦于缺少知识和科学真理，未能充分洞察客观世界的奥秘，不如说是苦于不善于用科学技术成果造福于人，不了解人的本性，未能充分洞察人的内心生活的奥秘。”⁽²⁾理论研究的任务不是确定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而是揭示和确定人的主体性及其活动领域。一切科学技术活动和伦理活动，都必须服从于人的主观性原则。存在主义、人格主义和哲学人类学等都把唤醒和恢复人的主体能动性，作为摆脱现代文明

“困境”的唯一途径。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业已表明，人类的生存和前途完全取决于自己的选择。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都与现代西方的“文化批判”思潮有着共同的感受、共同的愿望和共同的理论观点。他们都痛恨资本主义制度所滋生的邪恶、病毒和非人道现象，他们都渴望异化境况的终结和人性的“复归”，他们都立足于人性自身和人的主观意识来指责现在，评价现在和设想未来。自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一直致力于文化批判理论的建树，致力于人的主体性和人类的解放之间的关系的探讨，以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和革命的彻底性，为西方发达工业社会中的解放斗争提供一种合适的战略。他们自觉地和不自觉地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和历史哲学中汲取“营养”。他们或者用费希特、黑格尔和生命哲学的眼光审视马克思主义，或者从青年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发掘他们所需要的東西，或者把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或者以结构主义的方法解释马克思主义。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卢卡奇、葛兰西和马尔库塞等人的“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各种学说和思潮相互作用的产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按照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的解释，作为西方革命失败的产物，西方马克思主义“由于缺乏一个革命的阶级运动的磁极，……就不断地摆向当代的资产阶级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无产阶级实践之间原有的关系，却微妙而持续地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同资产阶级理论之间的一种新的关系所取代。”⁽³⁾这一解释只有部分正确，因为它没有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资产阶级文化的共通性，那就是不遗余力地关心人的生存境况和命运，寻找人性“沉沦”的原因和人类的出路。与当代资产阶级文化中的

普遍倾向一致，“最常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密切关注的，拿恩格斯的话来说，是远离经济基础，位于等级制度最顶端的那些特定的上层建筑层次。换句话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典型的研究对象，并不是国家或法律。它注意的焦点是文化。”^[4]

同样作为时代精神的产物，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同资产阶级民主的危机和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同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有着深刻的联系”。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革命形势的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大致经历了这么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以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年）、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和布洛赫的《希望的原则》为标志；第二个阶段从三十年代初到四十年代末，以赖希的性欲经济学、弗罗姆的《逃避自由》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为标志；第三个阶段从四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以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马尔库塞的“单面人”和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为标志。

在第一个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活动的轴心是二十年代西方革命失败的原因探讨。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等通过对二十年代西方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分析，指出欧洲各国工人运动的失败在于主观心理上的准备不足，以及“阶级意识”的不成熟。就在斗争的激烈情形下，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成员仍把资产阶级的国家、经济和社会制度视为当然的秩序。而造成“阶级意识”不成熟的直接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被庸俗化和实证主义化。在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那里，马克思主义成了一种机械的经济决定论、消极无为的反映论和抹杀人的主体性的规律科学。为了消除“物化意识”和引起西方革命的总爆发，就必须

把人的主体性置于理论和实践的首位，就必须还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在卢卡奇等看来，马克思主义原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正倚重于它的异化理论、强调人的主体性，马克思就不太注重分析客观结构（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结构），而是更多地透过经济现象去分析主观结构——物化意识、商品拜物教和资产阶级的文化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不是纯粹的经济学或历史学，而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总体辩证法和社会革命学说。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哲学来源，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的关系。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解放学说，其理论基础就来自黑格尔的总体辩证法和自我意识的异化学说。所以，人们往往把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和布洛赫的“马克思主义”称之为“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从他们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题、理论传统和学术风格业已确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的雏形已初步形成。在第二阶段，围绕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及其危害的社会心理分析，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走向心理倾向和性格结构的探索。赖希、弗罗姆和法兰克福学派不满于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力图使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互为补充，从社会心理的分析中找出社会过程内部的能动因素。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忽略了人的各种心理需要及其活动，没有阐明经济状况是怎样通过人的心理倾向转化为思想和行动的，也没有看到观念意识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某种劳动过程。而精神分析学专注于人的心理结构和行为动机，阐述了人的心理倾向对社会运动过程的反作用，并考察了社会是如何造就个人性格的，文化模式、家庭结构和政治制度是如何阻碍人们认识自己的。在他们看来，无意识—前意识—意识的心理系统，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结构，乃是深入探讨人

的主观能动性和文化的作用问题所必需的。他们的文化哲学着重阐述了传统家庭的职能、权威主义的性格结构以及现代“文化工业”等问题。他们强调社会危机的解决依赖于社会主体对自身处境的认识，依赖于旧的性格结构和心理倾向的改变。对法西斯主义和现代文明“病症”的诊断和根除，只注重人的性压抑和心理机制（象弗洛伊德那样）是不足取的，只注重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也是不足取的。作为客观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所具备的理论认识，乃是作为微观社会学的弗洛伊德主义所缺少的，反过来也是如此。所以，一种完整的关于人类解放的文化批判理论必须是这两种学说的长处之结合，必须充分揭示人的心理意识与社会政治经济相互作用的机制，必须把心理革命作为社会革命的前提。在第三个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进一步深化到对消费行为、日常生活，意识形态控制和“大众文化”模式的分析中。在列斐伏尔、马尔库塞等人看来，各种文化观念、心理倾向以及日常生活不仅仅是物质的反映，而是历史发展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心理意识既可以阻碍“物质”的进程，也可以介入和顶见社会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工业社会借助“文化工业”、技术至上和消费主义等意识形态的控制，使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愈来愈互相渗透，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愈发商品化，“控制消费的官僚社会”日益膨胀以及工人运动的沉默，表明物化意识抑制了人对自身的正确认识，并且扼杀了人的主体性。他们认为，在今天，“复兴”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在于把主体能动性原则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把人性的全面“复归”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核心所在。马克思主义必须同现代西方的社会学、精神分析学、文艺批判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结

合起来，从而把日常生活批判和“文化工业”批判同革命意识的形成联系起来。因为只有在日常生活领域（商品劳动、大众消费、文化娱乐和闲暇等）中，人们才可以直接体验到资本主义现存秩序的压抑和不合理性。“阶级意识”不是象学校里的课程那样，可以作为一套原则或公理传授给人们，它就起源于日常生活经验、心理倾向和性格结构的缓慢变化中。所以，对现代发达工业社会“病症”的根治和对物化意识的清扫，都有赖于主体意识的唤起和日常生活的改变，有赖于“总体革命”的实现和“全面的人”的形成。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当然也有完全背离文化批判理论传统的思潮，例如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德拉沃尔佩学派内的“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流派极力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实证性和无主体的历史观，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人本学或异化学说而是一门历史科学和认识科学。它们固然看到了文化批判理论传统的致命缺陷，指出了它的浪漫主义和唯意志主义倾向，但却走向另一个极端——否定人的历史主体的地位，无视主观意识的能动性，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批判性对立起来，把科学和意识形态对立起来，变马克思主义为不涉现实的学院理论。这种唯科学主义思潮只是对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批判理论的反动，即所谓的“物极必反”。它不能代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只有本书所要论述的文化哲学思潮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本书并不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看作一个完整的和统一的理论体系。因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中间，不存在文化哲学的“公理”和通用的模式。只是他们的共同关注、共同倾向和共同观点，才形成了西方马克